

中国为什么不花钱

武俊平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为什么不花钱/武俊平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1

ISBN 7-204-05038-X

I. 中… II. 武… III. 消费习惯-研究-中国
IV. 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667 号

中国人为什么不花钱

武俊平 编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300 千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04-05038-X/G·1113 定价: 21.80 元

目 录

1 第一章 六万亿元的沉重

从朦胧到清晰的梦想
驶出港口的改革航船
送出“涨价”换回“疲软”
“你们要搞快一些!”
90年代的“洋跃进”
“软着陆”
世纪末夏日的沉闷
“懒惰的老虎”睡着了

37 第二章 倾斜的财富大厦

平均数掩盖了贫困户
我们欠农民一笔债
肥水东流 孔雀南飞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谁制造了经济萧条

96 第三章 暴富群体:经济“肠梗阻”

转型时期的经济怪胎
改革的主要危险
公款“一条龙服务”
暴发户的住房消费
暴发户的“感情消费”
暴富者的乐园

125

第四章 权力市场化

双轨制养肥了多少蛀虫
企业是一块肥肉
“首长工程”千疮百孔
圈地运动肥了谁
权力的“期货”交易
案子也能“卖”

162

第五章 “穷庙富方丈”现象

“官本位”下的“自富权”
“回扣”的秘密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
吃里扒外 受贿卖厂
一夜暴富“原始股”
粮耗子
钱虫子

196

第六章 “假冒伪劣企业家”

“福布斯富豪榜”的神话
贪婪的“金钱游戏”

走私致富富了谁
谁在纳税 谁在偷税
充满想象力的造假运动

247

第七章 中国贫困群体观察

低收入群体分析
被文明遗忘的角落
腐败加剧了农村贫困
城市贫困浮出海面
贫富分化的社会效应

294

第八章 明天你到哪里上班

多米诺骨牌效应
为什么总是我牺牲
歪嘴和尚念错经
别拿下岗吓唬咱
冠冕堂皇的掠夺

316

第九章 老年社会的深层忧虑

老年人：你的苦处谁知道
苦乐不均的老年人
九亿农民的养老难题
寅吃卯粮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
基金贬值：现实的危险

329

第十章 房改：几家欢乐几家愁

谁更合算 一目了然

经济适用房,为何热不起来
空置房、危房和无房户
他为什么不买房

343

第十一章 不敢生病的年代

看不懂的药价
大病要张多大口
生不起孩子的人们
不透明的收费制度

356

第十二章 学校大门朝谁开

教育向金钱顶礼膜拜
择校生、自费生、议价生
大学:有才无钱莫进来

378

结束语 关键时刻的反思

“为多数人”和社会公正
没有民主,什么也办不好
启动消费,先启动信心

第一章

六万亿元的沉重

曾几何时，中国人最害怕的是通货膨胀，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最害怕的是资本主义，而通货膨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再者，计划经济下的供需完全是由国家一手操纵的，物价几十年不变，工资几十年不涨，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表现。改革开放以后，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逐渐松动，国家开始放开对物价的控制，多种所有制的出现使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浮出海面。

市场是一片流动的大海，物价就像海上的一叶扁舟随着潮起潮落而自然地波动，于是在 80 年代，通货膨胀这只“恶魔”就在中国登陆了。长期的短缺经济，使中国人唯恐货架上空空如也，看着物价一天天往上涨，老百姓恨不得把商店搬回自己家，于是，80 年代中国便出现了一阵阵抢购风。

人们难以忘怀：80 年代，手头儿开始宽裕的百姓已不仅仅满足温饱，消费目光投向家具、彩电、冰箱、洗衣机……而市场短缺又令各种票证纷纷登场。黑市上一张彩电票卖到 300 至 500 元、冰箱票 200 至 400 元，亲朋结婚送上一张彩电票无异最好的礼物，而能够弄到这小小票证者又被视为神通广大。小小票证是

消费者的敲门砖，是实现新的消费欲望的通行证。票证啊！票证！多少人为你神魂颠倒，废寝忘食！

人们难以忘怀：随着一次次物价调整而来的“疯狂大抢购”，给多少商家带来了意外惊喜，多年的滞销品出手、库存消失了，就连不制冷的冰箱，不出色儿的彩电、不转圈的洗衣机，甚至不配对儿的鞋子都被抢购一空。而如此“饥不择食”，又给多少顾客造成无尽的烦恼！

和老百姓一样，官方也对通货膨胀防范甚严，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于是，每当通货膨胀带来社会恐慌时，政府便采取紧缩银根或宏观调控，这一招往往是很灵的。

可是，经济学的规律却应了中国人的一句古话：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想追求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会伴随高通货膨胀；而要抑制高通货膨胀，则往往牺牲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朦胧到清晰的梦想

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人从“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幻梦中醒来，睁开眼睛看世界时，突然发现我们被飞速发展的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地刺伤了。

面对现实，我们只有奋起直追。

显然，我们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唯有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

现代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领导人共同的梦想，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明确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吹响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发的号角。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邓小平的复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重新提了出来，会议明确指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邓小平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的特点，提出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对于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议论和研究，认为“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搞现代化要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把“实事”弄清楚，然后才能从中找出它的规律。会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指出：我们是一个有九亿多人口的大国，其中80%以上是农民。我们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但经济还很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低。我们的国家穷，搞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人民又要改善生活，这就是矛盾；搞现代化，用人少，而我们有大量劳动力需要就业，这又是矛盾。“我们在这样的矛盾中来搞四化，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规划建设蓝图时必须考虑的基本出发点。”

在清醒认识了现代化建设的落后起点后，对原定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就不能不重新审视。其结果必然只能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坦诚地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随之，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着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邓小平形成了“三步走”的构想。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对“三步走”经济发展目标作了明确而又完整的表述。邓小平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

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至此，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构想完整形成。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实现“三步走”是一个使中国逐步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战略目标。邓小平的意图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不但可以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大大增强，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而且能够更加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说，“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中国人口多，如果到下世纪中叶时，人口达15亿，人均4000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美元，这大大超过美国1987年4.497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三十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驶出港口的改革航船

随着邓小平现代化构想的逐步成熟，中国的改革也在逐步发展。

邓小平深知，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 80%，改革从农村开始，不仅可以稳住这一大块 而且还会对城市形成一个包围圈；向城市渗透。况且，对广大农民来说，这是巴不得的事情。对政府来说，这是一种“无为而治”。

在农村改革中，安徽省和四川省先行一步，在当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为农民包产到户壮了胆。但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和指责。直到 1980 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表示支持，才算“多云转晴”。1981 年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肯定了“双包制”。1982 年后，“双包”责任制进一步走向全面推广并不断完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随之废除。到 1983 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 93%。1984 年初，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到 15 年以上。一包就灵，用它来形容农村改革并不过分，1984 年，农业生产就获得了罕见的大丰收。1985 年，中央又提出了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鼓励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放活农村金融政策，这些政策对农村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起了极大作用。改革使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到 1987 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 8805 万，产值达到 4764 亿元，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

1984 年，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在此以前，城市改革处在试点和探索时期，主要是打破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允许发展个体经济。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合资企业。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基本思路是扩权、让利、搞活。与此同时，受农村承包制的启发，国营工业企业也逐步推行经济责任制。这种办法任务明确，考核简单，企业在完成包工任务后获得剩余利润的大部分，因而得到迅速推广。为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在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和分配关系上，先后试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

干、以税代利等办法。此外，这一时期还对价格、信贷、劳动工资制度以及流通体制、财政体制和计划体制进行了改革。总之，1984年以前局部的、初步的、探索性的改革为1984年以后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规划了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蓝图，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

从此，城市改革全面展开。

城市改革的第一大收获，是多种所有制格局的形成。到1987年止，全国约有23.5万家私营企业，雇工总数为360.7万人。1988年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达659万人。

城市改革第二大收获是增强了国营企业的活力。为此，国家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企业经营方式。1984年底，国家进行第二步利改税，即国营企业只向税务局交税，不再向财政局交利。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企业从新增利润中得到较多的利益，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从1979年到1988年，国家在财政上采取了一系列减税让利政策，使企业留利大大增加。从1985年起，国家将集中的30%的折旧基金全部下放给企业。国家还赋予企业自主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权利。

从1987年起，企业改革从单纯地简政放权发展到健全和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阶段。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选择一部分亏损或微利的全民所有制

中型企业，进行租赁、承包经营试点。1987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1987年的改革重点要放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上，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认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此后，承包制在全国大面积推行。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型企业达到80%。到1988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承包面已达到93%，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达到95%，承包期一般为3至5年。

到1988年底，承包制的成效明显表现出来，它迅速扭转了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连续20个月下降的局面，强化了企业预算约束，企业实现利税有了极大增长。但也存在行为短期化、负盈不负亏等问题。看来，企业改革可不是一个“包”字能解决了的。

在这一时期，还对股份制进行了探索。早在1984年，我国即出现了股份制企业。1985年10月，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正式成立，专门从事股票的发行、转让及管理工作。随后，沈阳、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所。1986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次正式允许“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根据这一精神，股份制试点在一些地方铺开，其中广东省和上海、沈阳、武汉三市发展较快，但总的看来，股份制还处在试验阶段，还很不规范。

这一时期，与扩权和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相配套，对企业领导制度和劳动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有计划地试行厂长负责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三个条例，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基本制度肯定下来。

在劳动制度方面，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对打破就业上的铁饭碗起了积极作用。

在工资制度方面，企业改变过去的八级工资制，职工工资按新的工资类别和级别进行了套改。从1987年起，又普遍实行了国家核定企业的工资总额和增长幅度，企业内部分配由企业自主确定的办法。各企业普遍推行了百分计奖、浮动工资、定额工资和计件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方式。

1984年以后，价格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被放到突出地位，以放开价格为主。最重要的结果是出现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在产品价格方面，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20%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定价，至于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要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但企业可用计划自销产品与外单位进行协作。

1985年1月又规定取消原定的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限制，改按稍低于市场价格定价。从此出现了“同种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统一定价和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双轨制价格。1986年国家又正式放开了燃料、金融等主要物资的计划外资源价格，并规定企业超计划完成的产品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定价。

到1988年，实行双轨价格的产品占全部生产资料种类的40%，交易额占生产资料总额的75%以上，主要生产资料按市场价格销售的比例已超过50%。

经过几年的价格改革，由过去单一的固定价格改为国家牌价（固定价）、国家指导价（浮动价）和市场调节价（自由价）三种

价格形式；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企业定价和自由定价三种作价方式。这为搞活企业、活跃城乡市场创造了条件。

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对商业体制和物资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国家政策放宽，进一步打破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集体商业和个体商贩有了很大发展。

在搞活微观的同时，国家在计划体制、物资体制、投资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从1984年到1988年所进行的这些改革，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小修小补，有些改革措施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副作用，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那5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

送出“涨价”换回“疲软”

但是，1988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福州、天津、上海、重庆、成都、北京、西安等城市发生抢购的情况，全国其它城市、城镇和农村也随之发生抢购，且形成迅速蔓延之势。

对于这一场来势凶猛的抢购风潮，当时的报刊杂志有过不少生动的描述：

物价，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这个话题，绷紧了社会的神经。

各种流言不脛而走。人们不顾炎天火日，急匆匆涌上街头，挤入商店，大汗淋漓地向货架上投去恐慌和饥渴的眼光。抢购肥皂！抢购卫生纸！抢购皮箱！抢购洗衣机！长沙市友谊商店一位经理向记者说：“真是奇怪！顾客们像疯了一般！把钱不当钱，见什么都买。我们积压了好几年的毛毯一下就卖光了，质量最差的洗衣机也卖光了，仓库已经空了，营业额猛增，营业员大拿奖

金，一个个都笑呵呵的。”

杭州市的抢购也持续“高热”，库存棉、毛、日用品雪崩似地倾销，但人们还没有降温，百货公司前，常常出现整晚排队等候毛衣毛线的现象，凳子排成长龙，人们就睡在街上。

抢购的对象逐步扩展到米、食油、火柴、盐。早在三月的武汉，食盐要涨价的传闻蔓延到大街小巷，街头也出现安定人心的标语：“食盐绝对不会涨价，请大家放心！”标语旁边又出告示：“每人限购食盐两公斤，请准备好零钱，保证供应！”不用说，盐库再满也抵抗不住抢购攻势的。一位退休工人告诉记者，他算运气，通过关系，已经买足两百公斤盐，囤积在家里！

《小说界》透露：上海的抢购狂潮自3月2日始，2角6分的草纸涨到了3角8分。火柴，连7分钱一盒也买不到了。理发费、住宿费，也纷纷哗变。

新华社记者报告：南京的抢购狂潮自3月8日始，鼓楼地区一居民买了400盒火柴放在家里，因小孩玩火而酿成大祸。

而另一方面，很多电器商店则将电视、冰箱之类存起来，等待新的涨风。轻工部专家原来预测冰箱这年将滞销饱和，现在被营业员当成笑话讲。

抢购风潮使得商品销售量大幅度提高，8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比1987年同期增长了38.63%。据有关部门估计，这次商品抢购风，抢购了约60亿元商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商品抢购伴随着挤兑银行储蓄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26.8亿元。历史上8月份出现储蓄绝对额下降的只有1960、1961、1962和1967四个年份。这次突击提存，人们不仅动用活期存款，而且动用定期存款进行抢购。

面对这一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确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在治理经济环境和

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全会指出，当前我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困难和问题也不少，突出的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为了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在这两方面都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1989、1990两年一定要抓出成效，1989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较小。务必确保1989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89年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点。

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整顿的决策后，由于当年已进入年底，1989春夏之交又发生了全国性的政治风波，所以在1989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形势仍是严峻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全会认为，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要求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百分之十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相适应。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

伴随着治理整顿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198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1.4%，工业总产值约增20%，这速度不仅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